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

石泉 著

建安十三年冬，曹操大军与孙刘联军战于赤壁。这个赤壁古战场究竟在今何处？与之关联的古夏口、巴丘、下雩、蒲圻、公安等城邑以及古云梦泽、夏水、陆水又在今之何处？这些问题的解决，将重绘荆楚地区的历史地图。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WUHAN UNIVERSITY ACADEMIC LIBRARY

▶ 全 · 国 优 秀 出 版 社 ▶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

石泉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石泉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1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ISBN 7-307-04104-9

I. 古… I. 石… III. 历史地理—研究—湖北省 IV.
K92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1320 号

责任编辑:路小静 责任校对:王 建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whu.edu.cn)

印刷: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5 字数:345千字 插页:5

版次: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307-04104-9/K·256 定价:26.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自序

一、关于《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的回顾

本书是我 15 年前出版的专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以下简称《新探》）的续集。在《新探》中，我主要是围绕着先秦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江陵城的定位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细致而深入的探讨。在探讨中，提出了不同于目前流行说法的一系列新解，即：先秦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秦汉至齐、梁（下至梁末）江陵城，并非如流行说法所云在长江边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原江陵县）境内，而是在汉水中游以西、蛮河下游今湖北省宜城市南境；与此相适应，古代荆楚地区一系列著名的山川城邑，如古荆山、景山，古沮漳二水（今蛮河），楚鄢都、汉魏晋宋宜城县、临沮县、当阳县、枝江县等，也都在汉水中游西面的今蛮河流域及宜城平原上。由于这本书出版于 15 年前，坊间久已不见，而学界同仁或频有询问，这里有必要首先简要地概括一下其主要观点，以便于明了本书与《新探》之间的继承关系。

《新探》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楚郢都、秦汉至齐梁城的定位问题。第一，《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原载《文史》第 6 辑，中华书局 1979 年版，见《新探》第 57～73 页）与《关于“江”和“长江”在历史上名称与地望的变化问题》（原载《地名知识》1981 年第 2、3 期，见《新探》第 74～83 页）二文指出，古文献中的

“江”并非如流行说法所云是今之长江的专称，有时亦指淮水、汉水、沂水，以至汉水中游的支流蛮河（古沮水）等，甚至古文獻中的“长江”，其上游也往往是指汉水。澄清了这一观点，传统说法中以“江”必指今长江为前提而使用的大量带有“江”字并与古郢都、江陵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史料，就再也难以成为齐梁以前古郢都、江陵在今江陵县境的证据了。

第二，关于楚早期都城丹阳地望，前人有当涂、秭归、枝江及淅川诸说。在《楚都丹阳地望新探》（原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见《新探》第174~199页）、《楚都丹阳及古荆山在丹淅附近补证》（原载《江汉论坛》1985年第12期，见《新探》第200~210页）中，我们同意淅川说，并进而指出，西周早期熊绎所居丹阳，当在今陕西商州的丹江北岸河谷（这里离淅川说最近）。对于商州——淅川为楚丹阳之说的论证，联系到古代水上交通条件，为以今宜城楚皇城遗址为楚郢都之说打下了部分基础。

第三，流行说法向来认为，古沮、漳即今之沮、漳河。我们则根据汉魏六朝时一系列有关古沮、漳源流的记载，结合地形图和有关的考古材料以及实地调查所得，对于齐梁以前的古沮、漳二水之发源地与流向、所经城邑（如临沮、漳乡、当阳、枝江等）及其下游水道之变迁等，都基本上理出了眉目。概言之：古沮、漳应是汉水中游西面、流经宜城平原上的汉水重要支流，今蛮河流域。古沮、漳既然在今蛮河流域，则齐梁以前位于沮、漳下游的楚郢都、古江陵城自不能出今宜城南境。（参阅《齐梁以前古沮（雎）、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2期，见《新探》第211~257页）

第四，流行说法由于认定古郢都、江陵在长江边今荆州市荆州区境，乃大都把今宜城市南境的楚皇城遗址定为楚之鄢都、汉宜城县。在《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郢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见《新探》第258~348

页)一文中,我们首先指出,楚皇城遗址下限只到东汉,而古文獻中的楚鄢都、古宜城县下限则一直延续到二百余年后的刘宋前期,显然不合。然后,我们从探索古中庐城地望入手,经过细致的考证,对古中庐、郢县以及古维水、涑水进行了重新定位。把这些错位多年的古地名复原之后,就得以在此基础上抓住唐初的《括地志》和中唐的《元和郡县志》关于楚鄢都、汉宜城县在唐代的率道——宜城县南9里的关键性记载,先弄清唐宜城县及其前身率道县的位置。通过唐宋宜城县俗称“大堤城”这一线索,理出了刘宋至北宋700年间的大堤城沿革及宜城县南迁今址的大致时期。经过曲折复杂的层层探索与突破,结合实地考察遗迹与访求民间传说,更依靠了某些被忽视的珍贵史料以及有力的旁证材料,终于得出唐率道——宜城县在今宜城县北30里的小河镇东北七八里之羊祜汉稍东处的结论,从而初步认知古鄢都、宜城应在今宜城县北20里外。同时,针对流行说法误将古今鄢水合一,以今蛮河为古鄢水的情况,对古鄢水地望,利用宋元有关木渠的史料,也进行了重新探索,认为其上游当是今潼口河上游之石河,下游当为今潼口河,由于古汉水东摆而得以延伸,东南流入今汉水河床七八里,转东又数里,入古汉水。古鄢都、宜城当在此延伸东转后的古鄢水下游北岸。古鄢水与古宜城重新定位后,就更可以明确推证楚皇城遗址绝非楚鄢都、汉宜城县。

这些问题的解决,为最终确定先秦楚郢都地望扫清了障碍。由于自唐初以来都认为楚郢都在今荆州市江陵城北,而今江陵城北又确有一战国大城遗址,现称“纪南城遗址”,人们常认为这就是楚郢都遗址。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首先指出,考古学界据出土器物鉴定,纪南城遗址只有极少量春秋遗存,大量是战国中期偏晚的文物,这与古文献中春秋初期楚始都郢的记载不合;而其下限仅至战国晚期,又与古文献中郢都后继城市江陵一直延续至东汉的记载不合。同时,唐宋以来定今江陵城北之“纪南城遗址”为楚郢都的说法,与先秦至齐梁的一系列原始文献记载也不

合。我们从5个方面论证楚郢都当在今宜城楚皇城遗址。(1)以周围地区重要古地名的地望(如前所述)推定楚郢都、秦汉江陵城当在今宜城南境蛮河下游北岸近汉水处,与楚皇城遗址位置正合。(2)对今宜城楚皇城遗址的调查结果表明,此遗址上限可至春秋初期,下限直至东汉,其时限正与古文献中所记楚郢都、秦汉江陵城相合,而且城市规模相当于汉代郡城,亦与江陵县之为南郡治所正合。(3)魏晋时期江陵城址曾有两处迁移:吴曾把江陵城从北岸移到南岸,东晋中期桓温新修江陵,又移至北岸,“城临汉江”,但皆仍在今宜城境,与汉江陵城相去不远。(4)列举其他五项史证,进一步有力地加强了论据。(5)江陵城确已在长江边今荆州市荆州区境的时间上限在后梁萧督建立附庸国以后,迁移的原因是公元555年西魏攻陷梁元帝建都的古江陵城并加以毁灭性的破坏。至于今荆州市江陵城北之纪南城遗址,我们则根据遗址文化面貌与周围楚墓特点及其年代之上下限,推定它是战国时期楚国为开拓长江以南地区的需要而建立的一个陪都。(参阅《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见《新探》第417~501页)

在《新探》中,我们还对与先秦古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之定位有着密切关联的古代曾国(随国)、邓国—邓县、竟陵城的地望问题进行了探讨。《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原载《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见《新探》第84~103页)一文,主要就一系列曾国器物的出土地点与铭文,结合古文献材料,进行比较、印证,指出:铜器铭文中的曾国就是古代历史文献中的随国,其都城位置当在随州市区西17公里之安居镇北,淦水北岸;而西周、春秋时期的唐国故址并不在随州市西北40公里的唐县镇,而当在今河南省唐河县南。《古邓国、邓县考》(原载《江汉论坛》1980年第3期,见《新探》第105~126页)主要通过对古邓国、邓县地望诸说的辨析,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否定了古邓国在今河南邓县(旧邓州)的说法,而认定今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是古

邓国及宋齐以前邓县所在。这就为确定楚国早期都城——丹阳地望在丹浙谷地，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古竟陵城故址新探》（原载《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见《新探》第127~157页）有关古竟陵城地望的探讨则与古郢城、江陵城之定位有直接关系。《史记》、《战国策》均记载战国后期秦将白起拔郢后，“东至竟陵”。这个竟陵之所在，传统说法向来定在今天门、潜江境，或钟祥县南，以与将古郢都、江陵定在今荆州江陵境的说法相配套。然据我们所考，古竟陵城实当在今钟祥县北境、汉水以东的丰乐镇附近。古竟陵城的定位，为我们最后确定古郢都、江陵城在今宜城南境之楚皇城遗址（正在我们所考古竟陵城位置之西）、而非在长江边今荆州江陵境扫除了一个重要的外围障碍。

二、近15年来在古代荆楚地理方面的探索

应该说，有关古郢都、江陵城及其相关山川城邑地名的定位问题，在《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一书中已经基本解决了，但古郢都、江陵城的地望问题是古代荆楚地理的核心，牵一发必然需动其全身，除了《新探》中已经予以深入探讨的诸多问题之外，还有许多相关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在《新探》出版之后，我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有关问题展开探讨。

首先，《史记·货殖列传》称“江陵故郢都……东有云梦之饶”。古云梦之所在，不仅是关涉到古江陵城的定位，还是关涉到如何认识古代荆楚地区自然地理面貌及其演变之迹的大问题。关于古云梦泽，流行说法向来都认为是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的一个古代大湖，或一大片湖群沼泽的总称。我们在考察历史文献中一系列有关记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使之恢复其本来面目之后发现：前人对古“云梦”地望的解释，因时而异，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从较古的原始材料看，古代云梦泽实际上并不像今人所说的那样大；不同历史时期的云梦泽也并

不是始终位于同一地点，而且同一时期也往往有不止一处被叫做“云梦泽”的地方，但通常只有一个较为著称。具体地说，（1）先秦至汉初的古“云梦”（《左传》邲国之梦和《禹贡》“云土梦”）实位于汉晋江夏郡云杜县境，即今京山、钟祥间，大致相当于今洩水中上游温峡口水库一带，这是最早的“云（郢、邲）梦”所在。（2）汉魏六朝时期著称的华容云梦泽（又名巴丘湖，即楚国的“江南之梦”）则当在汉晋南郡的“江南”地区，即汉水中游以西的今钟祥西北境，蛮河南面、荆河北面的沼泽洼地上。（3）唐至北宋时著称的安州云梦泽则在今安陆市至云梦县境。这三个云梦泽分别在三段不同的历史时期著称，其他与之同时的云梦泽则由于各种原因，或者尚未受到普遍重视，或者已渐趋衰微，终致消失而鲜为人知。自唐以后，由于人们企图按照当时人的传统解释（其中包括未能鉴别以伪乱真的史料而造成的误解），以兼容并包的方式来协调、统一有关古云梦泽地望的各种矛盾说法，遂致把云梦泽越说越大，形成“跨江南北”的大云梦泽说，并渐成为最流行的说法。前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实因：第一，认为古云梦泽自古以来只有一个，因而看到故址所在的不同说法就牵合为一，遂致扩大了范围；第二，误以“江南之梦”之“江”为今之长江，于是把云梦泽的范围向南延伸到长江以南，终于包括了整个洞庭湖；第三，由于把有关的古地名作了错误的定位，尤其是定古枝江（有云梦城）在今枝江县境，定汉代西陵县（有云梦官）在今黄冈县境，因而向西向东都延伸了云梦泽的范围（参阅《古云梦泽研究》上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关于古云梦泽的探索，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很多年。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文化大革命”的间隙，我即抓住当时难得的机会，以《古云梦故址新探》为题作出详细提纲，全文结构初步得以形成。1979年春始成初稿，并在当年召开于西安的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作了简要介绍。后来，其中的一部分以《先

秦至汉初“云梦”地望探源》为题，收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的《楚文化新探》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最重要的部分，以《汉魏六朝华容云梦泽（巴丘湖）故址新探》为题，收入王永兴先生主编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之后，我又对全稿进行了系统的修改、补充，最后于1995年夏定稿，与蔡述明同志从自然地理角度探讨古云梦泽的五篇论文合在一起，以《古云梦泽研究》为书名，由湖北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

关于古云梦泽的研究告一段落之后，我就集中精力，在鲁西奇同志的协助下，开展对古夏口城地望，“赤壁之战”军事地理，古湘、资、沅、澧与古夏水等古代荆楚地区的重要河流之所在，六朝时期宜都、建平郡地望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三国“夷陵之战”军事地理等问题的探讨，相继完成了收入本书的《古夏水源流新证》（曾发表于《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又作了修改）、《古湘、资、沅、澧源流新探》（曾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4期，收入本书时又作了部分修改）、《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曾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又作了较大修改）、《“赤壁之战”军事地理新探》、《六朝时期宜都、建平郡地望新探——附吴蜀“夷陵之战”地理辨析》、《梁陈之际长江中游地区地理形势之巨变》及《古巫、巴、黔中故址新探》7篇论文，并对旧作《春秋“百濮”地望新探》（曾发表于唐嘉弘教授主编的《先秦史论集——徐中舒先生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古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在今河南省固始县东南境考辨》（原载河南省水利史志编纂办公室编《河南水利史料》1988年第1期）、《关于芍陂（安丰塘）和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始建问题的一些看法》（原载《安徽水利志》编辑室编《芍陂水利史论文集》，1987年内部刊印本）等作了部分修改，一并收入本书。

（一）《春秋“百濮”地望新探》。此文写作稍早（1987年），其内容主要是与楚早期都城丹阳在丹、淅谷地的说法相配套的。

“百濮”，在先秦文献中通称为“濮”。关于百濮地望，主要有“江汉以南”说，云南、川南说，川东说及川西说，其中云南、川南说及川西说都距楚地过于遥远，与春秋时的“百濮”居地显然合不上。根据考证，百濮当在楚的东南方，今枣阳市境桐柏、大洪两山脉的山区丘陵地带；而与百濮关系密切的麇之地望也不出随枣走廊西口外、今滚河西入唐白河后的唐白河下游西北岸地。麇国在此，就正当我们所考百濮西北不远处。而这样就更可对《左传》文公十六年所记，楚大饥，邻国各族纷起叛楚的地理形势作出更合理的解释。当时戎人在楚南方，先攻楚西南境，又攻东南境；庸人率群蛮叛楚是在楚的西方。据杜预注，庸国在魏晋的上庸县，即今湖北竹山县境。“申息之北门不启”，是指楚国北部也形势紧张。杜注：“备中国”，是指楚对中原也加强了戒备，防其自北面乘虚而入；而“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则是在楚东面（偏北），位于今樊城东北的麇国率领东南方不远的、今枣阳市境之百濮，聚集于选邑（故址不详，当近麇）也是完全合乎情理、说得通的。这样楚国面临四面受敌的危机形势就很清楚了。

（二）《古巫、巴、黔中故址新探》。此文的思路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初步形成。这是与古郢都、江陵城地望相关的另一重要问题。《史记·货殖列传》所云郢都、江陵“西通巫巴”之巫、巴，流行说法向来定在今长江三峡至重庆地区，以与主张古郢都、江陵在长江边今荆州市境内的传统说法相配套。而与巫、巴相联系的古黔中地望，则一向定在今湘西、鄂西南一带。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认真辨析考定，并与考古资料相结合，认定先秦时期的巴、巫、黔中均当在汉水上中游地区，而非如流行说法所云，是在长江三峡及其两端的重庆与鄂西南、湘西地区。其中古巴国当在今陕东南安康附近；楚巫郡当在今鄂西北竹山、竹溪与房县间，巫地（古巫中）的范围则继续向东包括今保康、南漳乃至宜城西南境；楚黔中郡则当在今豫西南丹水中下

游西面的浙川、内乡以及鄂豫陕三省交界的汉水两岸；秦灭楚后设立的扩大的黔中郡则包括楚黔中郡、巫中以及“江南”（今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至于今重庆、长江三峡以及鄂西南、湘西地区以“巴”、“巫”为称的山川城邑之名，则是由于原在汉水上中游巴、巫等地之人，在战国后期到三国时期这一漫长岁月中，不断向南迁移、并不断开发这一地区的结果。“黔中”范围的逐步南移，实际上也与这一进程有着密切关系。后人于此不察，以后世之地理观念解释、附会先秦史事，并为了弥缝有关矛盾冲突，不断“订补”、“整理”有关的文献记载（如今本《水经注·江水篇》），遂使问题越来越复杂，并去历史真实愈来愈远。弄清先秦巫、巴之所在后，《史记·货殖列传》所谓楚郢都、秦汉江陵“西通巫、巴”的记载就有了更合理的解释，并与我们定先秦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在今宜城南境的新说相配套，从而也从一个侧面加强了这一新说。而古黔中地望的初步解决，证明汉代由原秦黔中郡分出的长沙郡（国）与武陵郡北境均可到达长江以北、汉水中游以西地区，从而为探讨古湘、资、沅、澧四水之所在（皆在汉代长沙、武陵郡境内）打下了基础。

（三）《“赤壁之战”地理新探》。此文的研究思路也是较早就形成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配合教学，曾撰写了详细提纲，但迄未形成论文。“赤壁之战”战场的定位，不仅关系到对此役之过程、军事地理形势的认识，而且与古江陵、夏口、华容、蒲圻、下雋及云梦泽、陆水等一系列城邑、湖泽、河川的定位有着密切关系。实际上，流行的传统说法将赤壁古战场定在蒲圻—嘉鱼境内长江东南岸的赤壁山附近，正是与将当时的江陵城定在长江边上的今荆州市江陵区、夏口城定在今武汉市、巴丘城定在今湖南岳阳市、定华容及云梦泽在今江汉平原腹地等传统的解释体系相配套的。显然，这一套传统的解释体系不仅与汉魏六朝时期的大量原始记载相矛盾（这在我们此前的有关论著中已有详论），而且《三国志》、陆机《辨亡论》等原始文献中有关赤壁—乌林

之役之过程及战役前后军事地理形势的记载亦不相吻合。本文首先根据陆机《辨亡论》所记曹操大军主力由襄阳直下汉水，败于赤壁，以及《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和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所记吴水师乘东南风大起，从水上顺风纵火延烧曹军战船的史实，论证流行的蒲圻—嘉鱼说是不能成立的。然后，结合古华容、巴丘、云梦泽的重新定位，考定今钟祥市北60里汉水东岸的赤壁崖，即今中山口南的碾盘山，实应为赤壁古战场所。这里是汉水中游，正是曹操水师自襄阳南下所必经。根据我们的新解，当时的巴丘、华容与云梦泽皆当在今钟祥西北境，与汉水对岸的赤壁崖只相隔数十里；夏口城则位于今钟祥市区或稍南处，距上游的赤壁崖亦仅有60多里；古江陵城则在今宜城南境。这样，曹操进兵与撤退所涉及的一系列地名位置就很集中，战区亦只限于今钟祥北境和宜城南境的汉水及两岸河谷平原地带，与江汉平原及长江两岸低洼水乡毫无牵涉。

然而，欲论证赤壁古战场在汉水中游今钟祥市西北境，而非在长江边上的今赤壁市（蒲圻）境，还有一些相关问题需要解决。赤壁—乌林战场在蒲圻之说，不仅见于唐人记载，早在齐、梁以前就已出现了。较早的文献记载均表明，晋、宋、齐、梁时已有蒲圻县，且与赤壁邻近。问题的关键则在于，这个齐梁以前的古代蒲圻县是否像中唐以来的流行说法那样，认为就是与中唐以后直至近世的蒲圻县一脉相承，也定在今蒲圻市（现名“赤壁市”）内；与此相应，流经今鄂东南的通城、崇阳二县境内及蒲圻（今赤壁市）境，下游作为蒲圻与嘉鱼之间界河的现今陆水是否就是晋、宋、齐、梁时《水经注·江水篇》（今本）所记之古代陆水？这是在考定赤壁古战场地望时所必须澄清的。因此，在《“赤壁之战”地理新探》一文中，我们用较大篇幅，主要从六朝文献记载出发，论证古下雩与古蒲圻皆当在汉水中游以西、今钟祥市西北境的新解，而不能在今蒲圻、崇阳境。这样，我们就为最终确定赤壁古战场之所在扫除了障碍。

(四)《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此文是我们继古郢都、江陵城及古云梦泽地望考辨之后的又一场攻坚战。关于三国至齐梁时著称的古夏口城，流行说法向来定在今武汉市，而又有武昌、汉阳两说。宋以后，又有调和之论，认为先在今汉阳，孙吴以后，迁武昌，但亦无确据。夏口位于汉水入长江、有山险处，古今从无异辞。问题乃在古人心目中的汉水入江之处究在今何处？《禹贡》及汉晋时一系列记载皆云，汉水东行，至大别，转南入江。今汉水则东行入江，彼此不合。大别位置，前人亦有两说。一说在今汉阳龟山，但地形决定汉水无法于此大别山傍，南转入东北流之长江；另一说认为即今鄂豫皖边区的大别山脉西南麓，则又去汉水过远。两说互驳对方的证据，都有较强的说服力，说明两说皆误。因此，本文首先由汉水、大别的相对位置，论证古夏口不当在今武汉市境内；并引证晋、宋、齐、梁时的有关记载及政区沿革源流，彻底否定了古夏口在今武汉市境内之说；进而根据古大别之定位（当在今襄阳东、汉水东岸的大洪山脉之北端），确定汉水南流入江处，当在今钟祥市南、潜江市的泽口以北、汉水中游河段东岸有山处。据六朝时一系列记载，夏口城隔江对鲁山城，夏口城南还有偃月垒，亦称却月城，三城各据山丘，互为犄角。汉水中游河段的南部，具备这样地理形势的地方，只有今钟祥市城关附近或稍南处。今钟祥市城关西部为高丘，对岸则为三尖山之东南支脉黄土坡山。城关南面也有丘陵，地形与三城位置颇合。更往南不太远，就进入江汉平原。此后汉水已至下游，枝分汊流，不一而足。主洪道的宽度也远比中游收缩，成为大片河湖交错的水乡洼地，地理景观已与中游大不相同。明清人甚至还认为汉水至此，已难辨认，则古人认为汉水南入“江”处就在这里，也很可以理解。以此为基础，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六朝时期有关战役之军事地理的分析，初步认定古夏口城实当位于汉水中游今钟祥市或稍南处；正是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位于钟祥的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由

钟祥迁移至今武汉市。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初步排除了东汉末至梁陈之际三百多年间夏口城在今武汉市的说法，而将其位置定在钟祥市。联系到武汉历史地理的全面研究，我们注意到：汉魏六朝时期，今武汉一带的中心城市是今鄂州市（三国以来，直到民国初年，都称为“武昌县”）。梁陈之际，原在钟祥境内的郢州治所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后，重新控制长江中游以南地区的陈王朝复于今武汉市武昌区设立郢州及江夏郡；迨隋灭陈统一，郢州改称鄂州，附郭首县被定名为“江夏县”（县名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今武汉市武昌区才逐渐兴起，并取代武昌县（今鄂州市）成为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而武昌县的地位则逐渐下降，成为鄂州的属县之一。弄清这一演变过程，对于武汉历史地理与城市发展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五）《古夏水源流新证》。此文所探讨的古夏水位置之所在是与古夏口城定位有着密切关系的问题。《汉书·地理志》（卷28上）“江夏郡”下应劭注曰：“沔水自江别至南郡华容为夏水，过郡入江，故曰江夏。”沔水合夏水后亦得称夏水，夏（沔）水入江之口称为夏口，附近又有沔口，见于《水经注·沔水篇》（卷28）。《汉书·地理志》南郡“华容”县原注称：“夏水首受江，东入沔，行五百里。”则夏水为“江”水的一支别流，出自汉代华容县境，东流入沔（汉水）。成书于汉魏时的《水经》谓：“夏水出江津，于江陵县东南。又东过华容县南。又东，至江夏云杜县，入于沔。”自唐初以来，由于流行说法一直把先秦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时的江陵城定在长江边、今荆州市北境的纪南城（江津在其东南不远处，被认为即今之沙市），汉魏六朝时的华容县定在今监利县东境，云杜则在今仙桃与天门两市之间，这样，古夏水的源流就成为自今荆州东南，枝分江水，东（偏北）流经今江陵、监利、潜江、仙桃等县市，在今仙桃市附近注入汉水；汉水受纳夏水后亦得称夏水，流至今武汉市区入注长江，这样，关

于古夏水源流的解释遂与将古夏口定在今武汉市区的说法形成配套体系。然流行说法关于古夏水源流阐释，是以认定古江陵即在今长江边荆州市（江陵县）境、古文献中的“江”就是长江的专称为前提的。这一套解说体系，无论是在史料依据上，还是在地形上，都是不可能成立的。我们首先根据前此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证明流行说法关于古夏水源流的阐释的两个前提都是靠不住的，进而订正了今本《水经注》中有关记载所存在的矛盾与混乱，从而初步理清了古夏水以及古涌水的源流情况：古夏水所受之“江”当是今蛮河（古沮水，亦称“江”），分“江”之处在古江陵（在今宜城市南境）东南的江津（今蛮河下游北岸的璞河璠附近），东南流入沔。之后，我们结合古华容、监利、惠怀县的定位，进一步论证古夏水当流经今宜城南境、钟祥西北境，可能在今钟祥西北境丰山口稍南处流入沔水。这样，夏水入沔之口就与我们所考古夏口的所在（钟祥城或稍南）相距不远，则夏口城位于夏水入沔之口附近是符合实际的。

（六）《古湘、资、沅、澧源流新探》。此文是与古夏口、江陵、赤壁（蒲圻、下雋）等古地名之定位既密切相关又相对独立的一个课题。关于《鄂君启节·舟节》铭文及先秦至六朝典籍中的湘、资、沅、澧诸水，流行说法向来认为就是今湖南省境内的同名诸水，并常常据此以为在四水流域的古地名进行定位。而在对有关古记载进行认真考察之后，我们发现，这种简单地把古湘、资、沅、澧等同于今之同名诸水的说法实有许多不可通解的矛盾，有关记载本身和相互之间也有不少混乱难解之处，一些记载中的四水源流与今之同名各水的源流更多有不符。凡此，都不能不让人对那些以古今四水合一的流行说法提出疑问。在前人（主要是钱穆）研究的基础上，经过细致的考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 战国时期，荆楚中心地带已出现了以湘、资、沅、澧为名之水和“洞庭”。战国洞庭在楚之“江南”（今蛮河以南）；湘、

沅、澧与洞庭相近，也当在楚之“江南”。

2. 两汉至三国后期，四水有两套，一在湖北，一在湖南。在湖北境内的湘水，当即今汉水（又称“襄河”）；沅、资、澧三水都较为短小，在汉水中游西面，今荆门北境、钟祥西北境的荆河流域；古澧水与今荆河方位正合（荆、澧音同），古沅、资水据推定当是荆河下游的两条支流，故巴陵城向有“三江口”之称。与这三水相关的汉代地名，如充县、零阳、孱陵、作唐，及三国时著称的巴丘、公安等地名，也都在这—地区。而湖南境内的湘、资、沅水的上中游地区多河谷平原，开发较早，所以人们对各水上中游流域的认识也较早、较清楚；而其下游地区则因开发较晚，古代多为水乡沼泽地，当时人对其情况颇为模糊。据此，《汉书·地理志》及《水经》对沅水、资水的记载，当是糅合了两套同名之水的材料为一，其所记沅、资水的上中游是今湖南同名之水，而下游则是今湖北同名之水。遂致后人愈理愈乱。到三国后期，在湖北境内的沅、资水由于其下游地名如益阳等之南迁而相继消失，汉水的“湘水”之称，也逐渐不再为人们所提起，而以“襄”代“湘”，于是，今湖北境内遂只剩下澧水。

3. 东晋至齐梁之际，在今湖北境内的湘、资、沅之名已逐渐消失（偶尔也还为人们所知），洞庭与澧水之名则仍然留存着；在湖南境内的同名各水，尤其是湘水，则由于其流域开发的加速，经济地位的提高，逐渐广为人知，“湘州”的设置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在今湖北境内之澧水流域的南平、天门郡在这一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到梁陈之际，由于西魏于谨平毁江陵，以及随之而来的持续战乱，荆楚中心地带受到大规模的破坏，大量人口及其所居城邑之名随之南迁；此后，后梁及新建立的局促于长江中下游南岸的陈王朝在逐步稳定疆域之后，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政区作了较大调整，在今湘西地区重新设置了南平、天门等郡，以统治有关的流民。于是，与两郡相关的地名，也因之南移至长江以南今澧水流域。这样，古湘、资、沅、澧四水名称才完全成